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与体育

田标 编著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与体育

田标 编著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与体育 / 田标编著.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305 - 10960 - 7

I. ①中… II. ①田… III. ①社会思潮—研究—中国—近代 ②民族形式体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B25
②G8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4113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与体育

作 者 田 标

责任编辑 田 雁 编辑热线 025 - 83596027

照 排 江苏南大印刷厂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38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0960 - 7

定 价 28.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经世思潮与体育

- 一 经世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 / 2
- 二 经世思想是近代国人探索强国路径的思想武器 / 8
- 三 经世思想是近代中国体育二元建构的精神力量 / 17

第二章 洋务思潮与体育

- 一 洋务思潮的兴起 / 32
- 二 洋务派体育思想的来源与体育行为选择的价值原则 / 53
- 三 洋务派引进西方体育的实践及历史地位 / 67

第三章 进化思潮与体育

- 一 “进化”成为“公理” / 71
- 二 进化思潮改变了国人的体育认知 / 85
- 三 中国体育的二元结构加速建构 / 94

第四章 维新思潮与体育

- 一 维新思潮的兴起与高涨/ 103
- 二 维新思潮萌动了新的体育认知/ 116
- 三 维新派的体育实践/ 128

第五章 民主革命思潮与体育

- 一 民主革命思潮风起云涌/ 132
- 二 新式知识分子尚武救国/ 141
- 三 借体育武装反清/ 147
- 四 体育强种强国/ 151

第六章 教育救国思潮与体育

- 一 教育救国思潮的历史脉络与基本主张/ 156
- 二 教育救国思潮引导体育教育思想更新/ 171
- 三 教育救国与尚武救国双曲同奏为
军国民体育/ 178
- 四 清末教育改革诞生了中国第一个体育学制/ 188

第七章 激进民主主义思潮与体育

- 一 激进民主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内涵/ 209
- 二 “生物体育观”向“人的体育观”转变/ 226
- 三 激进民主主义思潮营造了自然主义教育理论
传播的思想环境/ 234
- 四 新价值观念确立促使军国民教育衰败/ 238

五 “科学”精神催化了中国体育科学研究的起步/ 243

六 女性自我发现促进了女子体育的发展/ 247

七 反对尊孔复古批判国粹体育/ 251

第八章 东西文化论战与体育

一 东西文化论战/ 256

二 土洋体育之争/ 261

第九章 抗日救亡思潮与体育

一 日本侵华与抗日救亡思潮高涨/ 279

二 体育服务于抗日救亡的思想碰撞/ 283

三 国民政府实施战时体育/ 292

第十章 新民主主义思潮与体育

一 马克思主义传入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 298

二 马克思主义引领新民主主义体育思想/ 308

三 新民主主义体育实践/ 316

后 记/ 321

第一章

经世思潮与体育

何谓“社会思潮”？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作这样的解释：“凡文化发达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互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寢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至于衰息。”“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①意为在一定社会中因环境变迁与心理感召之需要而产生的满足时代发展要求逐渐被多数人认同的价值指向一致的思想体系。社会思潮是一定社会中的人为了满足时代发展要求而制造出来的，然而它一旦形成，就成为异于人的存在的社会环境，规范和引导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

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引发了中国社会危机显现且随着侵略的加深而不断加剧，另一方面刺激和刺痛着中华民族爱家护国与民族复兴的神经，加速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西方殖民侵略二重性的作用下，近代仁人志士思想深处的经世致用精神被激发。

经世致用是儒家固有的传统，鸦片战争前后兴起的经世思潮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与沟通的桥梁，向西方学习是经世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31



思潮演绎的必然结果。经世思想为西体东输打开了社会心理的阀门,确立起了西体东输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近代延续和传承的精神指南。

一 经世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

经世思想的渊源 在我国,“经世”一词早在周代就已经产生了,它不一定是儒家的专有之物,如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贬。”在这里“经世”意为“祖述轩、项,宪章尧舜,记录时代,以为典谟。”^①作“典谟”、“规则”解。

自西汉“独尊儒术”后,历代的儒生以通经致用作为读书治学的目标和抱负,经世观念才逐渐演变成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具有相当积极的人世价值取向,如《后汉书·西羌传》中写道:“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煎当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②

到了宋、元、明时期,理学家开始强调“穷理致用”、“学以致用”,以是否“有用”作为判断和衡量一切活动的价值标准。

及至晚清,西方入侵造成中国社会统治危机、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凸现,隐藏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深处的强烈入世精神和拯救危机的自觉意识日渐显露,在19世纪中叶汇聚成一

① 王先谦:《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7:21

② 《后汉书》卷一百十七《西羌传·论》

股社会思潮,正如王先明在《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一书中所说:“以入世为出发,主动参与社会的风气……到了19世纪中叶又逐渐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思想潮流。”^①

经世思想的哲学基础及内涵 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传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所以,经世思想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面对现实社会积极入世的人文精神、“学以致用”的优良学风及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方法,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经世思想产生的哲学根源是儒家所信奉的实用理性精神。李泽厚在论述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时说:“孔子正是把握了这一历史特征,把它们概括在实践(用)理性这一仁学模式中。”^②孔子是提出实用理性的第一人,并且“通过教诲学生,‘则定’诗书,使这个模式产生了社会影响,并日益渗透在广大人们的生活、关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通过传播、熏陶和教育,在时空中蔓延开来。对待人生、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善于协调群体,在人事日用中保持情欲的满足与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盲服从……它终于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

① 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1

②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中、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38



化——心理结构”。^①

在实用理性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下,后世知识分子非常关注现实的、此岸的价值,以解决社会、人生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热衷于对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问题的研究与探索,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因此,他们将学术与政治交融在一起,治学是手段和过程,治世济世是目的和终极追求,提倡学术着眼于社会、服务于社会,从而使学术与文化成为改造社会、引导社会的良方妙药。具体而言,是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使命,将“内圣”与“外王”相结合,学习与研究经典和历史,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批判现实,倡言变革,从经典和历史中寻找“经世之大略”,以便匡济天下。故龚自珍说:“欲以其言辞裨于时,必先以其学考诸古。不研乎经,不知经术之为本源也;不讨乎史,不知史事之为鉴也。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②顾炎武也指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③

实用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的特点,即它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并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辨的抽象,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妥善地处理它。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思想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一是积极入世的自觉意识;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三是突破陈规、勇于变革的改革意识;四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五是兼收并蓄的开放意识;六是提倡实学的创新意识。

①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中、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37

②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对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14

③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在近代,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实践内容的变化经世思想的内涵也随之发生转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主要是指儒家的经典和掌故,“世”是指封建统治、国家治理,这样,“经世”意指学习儒家的经典和掌故,在内则提升道德情操和品质,出外则辅助君王,维护和传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传下来的“道统”。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冲击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学”,“经”和“世”的内涵都发生了变化,“经”是指“新学”,“世”是指民族自强和救亡图存。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学”以及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经世思想发挥作用的理论根据改变了,任务和目的由维护封建统治和儒家道统转变为争取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富强。然而,作为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已存在的思维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指导原则并没有改变,无论是五四时期的批判传统文化、提倡西化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胡适等,还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没有超出经世思想的传统。

经世思想与中国文化生命机制 陈寅恪先生曾揭示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的现象,即中华民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外来文化是“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的地位。”^①这种文化现象内在地包涵了一个文化发展机制,即中国文化拥有自我保持、自我更新并且是自强不息的生命机制。正因为有这样的文化生命机制才使中华文化能够应对一个又一个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挑战,使自己顽强地延续下去而不发生中断,数千年间延绵不绝。如面对由汉代发轫经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的佛教文化的大量输入,中华文化并没有将其拒之门外,而是主动吸收、融合,将其纳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52



人自己发展的主旋律中，整合成一个恢宏博大的新儒学体系——宋明理学，从而使自己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获得了新生。明朝末年，西学作为陌生的学问随着传教士的东来，传入中国，在中国社会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尽管当时有不少非理性的盲目排外者，但还是有相当一批士大夫继承了中华文化那种勇于吸收外来文化、发展和丰富本民族文化的进取精神来悉心研究它。像徐光启、王征等，他们译介西方学术，仿照西方奇器，虚怀若谷地吸纳西学，积极发展中学。他们这种的言行举止正是中华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那种宏大气魄的延续。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文化为什么能够产生自我保持、自我更新以及自强不息的生命机制呢？

文化因人的需要(生产、生活、交往等)而被创造的，人是文化世界的主体和创造者。但是，文化，特别是文化传统不是消极被动的，因为文化世界一旦独立出来，就不再是一种自然存在的力量了，而是作为人生存和发展的独特环境而存在，对人的社会性存在发挥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文化环境不仅是人社会化过程不可缺少的外部环境，更是起到了建构人自身以及社会的价值意识和思维方式作用，“文化世界建构价值意识就是通过这一特定文化环境，在人的文化心理机制上积聚、沉淀文化世界的价值和意义的过程。如果这些价值意识通过数百年上千年的整合、凝聚、内化而形成某种模式时，人们对外部文化世界的认识，对其文化价值的选择、感受就会受既定文化价值意识的支配，它就会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价值定向。这就是说，人们划定异质文化的价值不是采用‘是什么’的方式，而是‘应该是什么’的方式，这个‘应该’二字即包含了对本

土文化模式的无条件肯定。”^①由此,中国文化自强不息的生命机制作为中国文化内部自身的发展机制,实质上是中国人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赋予的。由于中国人自孔子始就确立了实用理性思维,汉代后儒家文化一体独尊,在实用理性思维指导下的经世传统便内化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经世的集体无意识经过文化的沉淀,遂成为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在此背景下,“经世”文化传统成为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作为中国人社会化的制约力量而存在,同时也成了中国人创造历史和文化的价值定向和思维方式。

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宗旨、以实用和功利为特点的经世传统在文化创造和发展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积极入世的自觉意识使中国人能够敏锐地认识和跟踪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主动地解决实际需要,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如农业生产的需要产生了天文学;丈量土地的需要产生了算术;长寿的需要产生养生学;灌溉及水患治理的需要产生水利学等等,正因为此,马克思说:“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②由此,需要的满足与更新之间的矛盾是中国文化自强不息的真正动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

① 李双壁:《从经世到启蒙——近代变革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2:27

②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



意识造就了中国人,而早熟的农耕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形成的文化势差又使得中国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产生文化独尊心理和文化中心主义思想,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封闭的地理环境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自我中心意识更加强化。同时出于维护封闭的生活方式的安全需要,则始终保持了一种较强的防范心理,对外界存在着过多的猜疑和过于敏感的戒备,担心文化被超越、价值体系被颠覆,所以要千方百计地保持自我,强化自我,以文化中心主义思想看待外来文化。然而,为了保持自我和强化自我,必须具有突破陈规、勇于变革的改革意识、兼收并蓄的开放意识、提倡实学的创新意识,能够广开言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兼容并包,革新图治,不断从历史和现实、内部和外部寻找文化发展资源,融入文化发展的新元素,使文化自我更新,始终保持活力。

二 经世思想是近代国人探索强国 路径的思想武器

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风生水起 经世思想内隐于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思想深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其强弱显隐程度直接受到外在历史环境的左右。一般说来,社会平稳安定,封建专制统治强劲有力时,经世观念就隐而不彰,藏而不露;一旦社会危机四伏,封建专制统治衰弱,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之际,经世意识就会活跃起来,“正像是‘暗者不忘言,痿者不忘起’一样。”^①

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的兴起,从根本上来说,是时代剧烈变动和中国社会思潮自身长期发展的结果。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5

首先,社会激荡,衰世显现,激发了知识分子思想深处的经世精神。时人论析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情景说:“今日之时势,观其外犹一浑全之器也,而内之空虚无一足以自固。”^①说明清朝时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已是百孔千疮,穷途末路。特别是嘉道以降,“财用不足”、“人才不竞”、“四民皆荒”和“令不行于境内”,清王朝江河日下,“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末世衰象日渐显露,昔日的“天朝”已因其落后而变得颜预老态,清朝的统治正处于由盛而衰的急剧转折时期。朝廷之上是庸鄙腐朽的老大臣,省府州县是贪官、猾吏、劣绅豪强的天下。漕、河、盐、兵等重要内政,无不百病丛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势必奋起反抗,各地民众起义此起彼伏。恰在中国封建统治衰微之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炮火所轰开,古老的封建帝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更造成了一种千古未有的社会大变局。深重的内忧加上日亟的外患,唤醒了一部分先觉士大夫的经世意识,如魏源、林则徐、姚莹、龚自珍、包世臣、徐继畲等,他们敏感地察觉到了当时四伏的社会危机,预感到了社会大动荡的风暴即将来临,出于强烈的危机感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他们以匡济天下自命,以挽救民族危机为己任,纷纷离开书斋,走出象牙塔,把目光投向政治,投向现实社会,欲以自己的满腹经纶来匡济天下,力挽狂澜。他们批判封建专制统治,声讨吏风败坏,抨击朝廷上下文武官员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下,却粉饰太平,征逐歌舞;他们揭露由于土地兼并造成贫富不均日益严重,“豪强兼并……无田者半天

① 林则徐:《云左山房文钞》卷四



下”^①，“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可清王朝还“开捐例，加田、加盐价”，真无异乎自啖己肉，自取灭亡。他们谴责科举制度，认为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千篇一律，毫无用处。“士子以腐烂时文互相戈取科名以去，此人才所以日下也。”^②由此，他们不无担忧地感慨：“起视其世，乱亦竞不远矣。”^③

其次，经世思潮兴起也是中国学术自身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所致。清朝统治者在巩固其统治地位之后，为消弭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反抗意识，加强了对文化学术的控制。一方面屡兴文字狱，实行高压政策；另一方面，又开“博学鸿词科”，设《四库》馆，以笼络士人。在残酷镇压与羁縻怀柔相结合的文化专制政策下，再加之当时承平日久，经济比较繁荣，因而使士人视接触现实为畏途，“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知识分子不得不专注于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于是在乾嘉间考证学勃然兴起。但是，知识分子失去了那种参与现实、触及时弊的勇气，抛掉了其“经世致用”治学的主要精神。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即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至嘉道之际，乾嘉考据学弊端日益暴露，因其繁琐僵化，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着学术的发展，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强烈不满和批评，如李兆洛便批评乾嘉考据已为“八股”文章，成为一些人“藉以取名”、“希取富贵”的工具，谓其繁琐的学风，“波流至今日而极，而掇拾愈细，其味愈薄，亦稍稍有

① 吴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册）·因时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2：57

②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933

③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7



厌之者矣。”^①还有人批评说：“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务为欺蒙，学术衰而心术坏。”^②由于封建社会的危机及鸦片战争的刺激，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脱离实际和崇尚空疏的学风中回归到经世致用上来，转向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他们站在通经致用的思想方法下，讽讥时政，说排专制，倡言变法，开启了学人议政之风气，极大地激励着晚清士子学人转向经世之学。所以，余英时认为“晚清经世思想的兴起决不能解释为对西方挑战的反应，而是中国思想史自身的一种新发展，其外在的刺激也依然是来自中国本土。”^③

另外，统治者的提倡也是经世思潮兴起的重要推动力。中国自古以来，皇帝及权威人物的言行往往对社会有着重要的导向和模仿效应。之所以说皇后母仪天下，就是这个道理。再如马球之所以在唐朝非常流行，就是因为唐朝的皇帝喜欢打马球，于是民间社会纷纷效仿。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道光帝即位之初就呼求经世之才的出现，认为：“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通经致用，有治人而后有治功，课绩考勤，有实心而后有实政。”^④他积极提倡经世致用，正如谓“君王好高髻，城中高一尺。”从而诱致士大夫们趋之若鹜地从纯学术转向经世之学。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即使是处在清中叶乾嘉考据学极一时之盛的时代，“传统的经世意识也并没有从中国思想史上完全消失，它仍然深藏在儒学的底层”^⑤。自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的兴起以后，就再没有出现过退潮，也没有出现过时隐时

① 李兆洛：《与方植之》，见《养一斋文集》卷十八

② 沈鑫：《与孙愈愚》，见《落帆楼文集》卷八，第21页

③ 余英时：《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259

④ 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五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6：17-20

⑤ 余英时：《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258